

经济生活中的边界

汪毅霖

提示 所谓“中庸”，贵在执中。从一个经济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认识和处理经济生活的种种问题时，要有度的概念，不可越过合理的边界。因为，任何越过了合理边界的行为，都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和混乱。陈彩虹的《在高山和天空之间》一书，借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阐述经济生活中合理边界的要义，体现了其思想上的警醒和前瞻。



对于陈彩虹教授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很有亲近感。一是因为我们同文同种，都不喜用数学模型而是坚持用文字来表达观点；二是陈教授的文章不仅文字隽永且文理深刻，常可给我以思想上的启发，《在高山和天空之间》，颇有些思想上的收获，愿在此与诸

君分享。 严复在翻译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的政治哲学名著《论自由》时，将书名意译为《群己界限论》。这里的界限，说的就是个人和集体之间要划定合理的边界，然后才能有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的统一。不唯如此，按照经济学思维模型，任何越过了合理边界的行为都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如宏观上货币发行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不足则会引发通货紧缩；又如微观上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有政府失灵，完全放任市场的自由竞争又无法避免市场失灵；再如中观上产业政策过多过滥会有“理性的自负”之嫌，而产业政策的空白又不利于一国的产业价值链升级。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陈彩虹教授在自己的新著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经济生活中应该存在合理边界的思想。作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所借用的都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从而彰显了这些作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统一。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并逐渐走向深入的现实，作者既看到了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面向，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之前三次之处在于，有智能远超过“自然人”的“机器人”诞生，故机器替代人类的主要内容不再是人的体力劳动，而是人的脑力劳动；同时，基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可以替代上帝的角色，创造出按照生物学标准远胜于“自然人”的“基因人”。老人类（“自然人”）面对新人类（“机器人”和“基因人”）的竞争，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这实在是一个攸关老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大数据问题上，作者再次体现了其思想上的警醒和前瞻。

作者承认，大数据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但是，过度滥用甚至迷信大数据，那么就会发生本末倒置。收集和 处理大数据都有机会成本，为了节约稀缺资源，人类不可能穷尽大数据，故大数据并非一种完美的工具。所以，用大数据来招聘大学生，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种辍学者肯定不会被选中；用大数据分析购物行为，会发生将婴儿用品广告寄给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道德危机；用大数据来分析可能的犯罪倾向以提前预防犯罪，现实社会可能陷入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情境。

所以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应用创新的科技成果时，人类必须控制适度的边界。过了这条界限，工具就会反过来“异化”人类，或者说人类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成了立个菩萨自己拜。

新型拜物教所反映的根本问题还是“反中庸”，即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等高科技发展的认识存在极端化的褒扬倾向，而没有关注它们的副作用，更少有人想到了防止副作用而必须设定技术的适用边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陈彩虹教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也存在着“反中庸”的倾向，即忽视了对理论的适用边界的考察，一味宣扬理论的普遍意义。由于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极端的，所以当人们运用理论来认识经济社会生活时，自然难以避免极端化。

君不见，在经济学中，各种理论各执一端，立场和观点迥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崇“看不见的手”而反对任何政府干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则主张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强力干预。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经济行事，我们就只能静待经济危机的自然消退，

而枉顾凯恩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的讥讽。反之，一味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我们就必须承受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率过高等长期后果。可见，在应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若是偏离了中庸之道，越过了理论的合理边界，那么必将是过犹不及。

为了化解经济学理论和应用中的极端化倾向，陈彩虹教授在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生活常识。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无法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只具有逻辑意义而无经验意义，故并非以致意为目的的科学理论而仅是智力上的逻辑训练。于是，生活常识是经济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检验标准。按照理论所给出的解释和预测可以在意料之外，但必须在情理之中，过于极端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是经不起生活常识看似朴素的检验的（虽然这种检验方式在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眼中看起来或许真的好Low）。

朴素并不意味着不实用，用陈彩虹教授的话说，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常识可以为理论提供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提供给经济学理论生活常识性的证明，这时，理论学说与生活常识具有一致性，经济学的结论与常识性的结论高度吻合；另一方面，提供给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生活常识性判定，区分出经济学理论的特色与生活常识的特色来，并且引发经济学理论更为广泛的思考。”在科学哲学中，第一种情况被称为确定，第二种情况被称为证伪。当经济学理论被生活常识所证伪时，就意味着我们发现了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而这恰恰可能成为新的理论创造的

契机。

可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含义，就不仅是侵略性地突入到其他学科 的领域，也在气势汹汹地抗拒着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来自生活常识的批判。而恰恰是如此之势，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现代经济学本原的基本价值——源自生活的生命力和服务生活的洞察力，不少经济学理论‘制造品’，变成了经济学家们自我欣赏的书面游戏或文字游戏”。在世界经济正因为全球疫情而面临新的变局，经济学家们却习惯性地让人失望的背景下，这一批评无疑听起来更加振聋发聩。

发现好的理论工作，有时候会有为其添柴加薪的冲动。陈彩虹教授认为，经济生活与经济学理论都应该秉持中庸，在生活中不可越界，在理论上也不可过度极端。美好的经济生活需要合理的边界，这应该无需争论，但问题是，边界如何确定？在人类社会中，群己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乃至邻里之间的边界都是一个集体选择问题，不同的集体选择规则会对边界划定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而决定采用何种集体选择规则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集体选择问题。此外，经济学理论在应用方面不可极端，这似无争议，但理论本身的极端化似乎并非全无好处，因为这为进一步（可能是朝着更符合常识的方向）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基准参照系。经济学家们始终需要在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彻底性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之间做出权衡。这些内容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陈彩虹教授这本新著的研究范畴，或许可算是笔者对这本好书的吹毛求疵吧。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日记共看的乐趣

叶 新

日记命名的浦江清日记等，还有其他同时代学人写的日记。

季美林在《清华园日记》中经常提到本系教授吴宓先生，但是吴宓日记中则无一处提到季美林，倒提到了他的同班同学王岷源。而朱自清的日记中有一处则提到了季美林，他在1934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善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美林文。”此文即季美林关于丁玲《夜会》的书评，本是负责《文学季刊》书评的李长之所约，但再版时被巴金抽掉。而这当然引起了季美林的强烈不满。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心里很不高兴——《文学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错，我的确不满意这一篇，而且看了这篇也很难过，但不经自己的许可，别人总不能乱抽的。”他第二天还不能忘怀此事，又写下“因为抽稿子的事，心里极不痛快”。

本来季美林不怎么喜欢叶公超教授，但是后者欣赏他的文章，反而给了他

发表的机会。他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中提道，叶公超“喜欢《年》……叫我把《年》，改几个字，在《寰中》上发表”。但是，同年5月3日的日记记载“看到《学文》月刊的广告，我的《年》登出来了，非常高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次偶然的机 会，笔者竟然在同年2月13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了答案：

“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任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寰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畴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

原来是叶公超先生提议的杂志名称《寰中》被否决了，代之以《学文月刊》。可能大家猜不到的是，这一期创刊号不仅有季美林的文章，还有林徽因的两篇名作：《九十九度中》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笔者曾于2018年夏天重新识别并了解了季美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起因是该日记2002年出版后，还有不完美之处。今年10月又策划出版了夏鼐先生的《燕园清华园日记》，因为两位先生都是1934年6月毕业，同属第六级。虽然同属文学院，但季美林先生是外国语文学系，夏鼐先生是历史系。两者的日记从日期上看，有两年完全重合，时间在1932年8月到1934年8月之间。虽然两人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但两相参看，也有不少共同的日记记载，读来别有趣味。

比如，1932年10月7日的夏鼐日记是：“晚间赴第六级级会。与星期二的浙江同乡会一样，吃吃茶点，胡闹一番。”而季美林的日记记载：“晚上开级会，到会人数极少，一进门就嚷着吃茶点。所谓讨论会务简直是胡诌八扯。终于茶点吃到了，于是一哄而散，不混蛋者何其少也。”两人都参加了第六级级会，连感受都差不多。综而观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载大多涉及一些学校或者年级层面的活动，比如同

时参加开学典礼，同去听胡适、伯希和的演讲，甚至同看电影《采女婿》，同样熬夜看狮子座流星雨，等等。

当然，虽然共同参加活动，感受却不一样。夏鼐在1932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听胡适之讲演”，感受见第二天写的日记：“晚餐后与王叔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鋒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不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慨。但季美林听后 的感受是“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来，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可贵相互参看的不仅仅是这两本日记，还有比如长期任教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日记、最早以“清华园

鲁迅的幽默

谢其章

上世纪30年代，三个倡导幽默小品文风格的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领风气之先，却非议满城，尤其是鲁迅，说过不少批评的话，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

在《从讽刺到幽默》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而而笑’的自然也不少。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查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所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期刊部分”，《论语》鲁迅收藏了34期，《人间世》是全部的42期，《宇宙风》仅5期。

这三种杂志，《论语》挨鲁迅批最多，虽然鲁迅给《论语》写了六七篇稿子；《宇宙风》，鲁迅似乎“不予理会”；对于《人间世》，鲁迅的态度：“《人间世》我真不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1934年5月10日致函台静农）三种杂志，陶亢德

均深度参与，通过鲁迅给陶亢德的十几通信，大致可了解鲁迅以真幽默对付伪幽默的态度和技巧。

1933年10月23日鲁迅回复陶亢德的邀稿：“惠函谨悉。我并非全不赞成《论语》的态度，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我看来有些无聊。……现在和《论语》关系尚不深，最好是不再漩进去，因为我其实不能幽默，决难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彼此都不便也。”

1934年5月18日鲁迅更明确地告诉陶亢德：“《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馥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幽默常常被当作“开玩笑”的同义词，实则两者大有不同，幽默往往表现在文字上，开玩笑则常常表现在谈吐上。生活里有的人开得起玩笑，多数人是开不起的。

鲁迅曾半幽默半玩笑地嘲讽过N次邵洵美：“最好是有富翁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无印本。”（《登龙术拾遗》）譬如吧，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拿来主义》）

用错地方的幽默有如鲁迅所言“动辄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1934年3月29日鲁迅回复陶亢德的信里有这么两段，“以肖像示青年，却滋笑柄，乞免之，幸甚幸甚。”“《论语》久未得见，但请先生勿促其见惠，因倘欲阅读，可自购致也。”看似很平常的话，却大可玩味。

第一段显示了鲁迅的先见之明，《人间世》筹办之初，拟每期登作家像一幅，特向鲁迅请赐，鲁迅婉拒之。果然《人间世》第一期便闹出了“五十自寿诗”风波。第二段的意思很明确，“想读的话我自己会花钱去买”。

陶亢德仍旧给鲁迅寄送《论语》，那时的邮递速度真快，两天后，4月1日鲁迅致函陶亢德再度表明态度：“《论语》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即读一过。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是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实，甚至且堕入油滑。……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然亦只能姑试之耳。”

十几天后，同样意思的话，鲁迅又幽了“幽默大师”林语堂一默：“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并‘非私人请托’，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

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又久不弄笔，实亦不符；而且示众以后，识者骤增，于逛马路，进饭馆之类，殊多不便。”（1934年4月15日致函林语堂）

鲁迅不愿意将照片公开在刊物上，也不愿意在家里会客。1933年11月13日鲁迅致陶亢德信里称：“我在寓里不见客，此非他，因既见一客，后来势必至于非广见众客不可，将没有工夫偷懒也。”

黄萍荪所撰《雪夜访鲁迅翁记》乃向壁虚构之作，但是黄萍荪也说出了刊物编者的初衷：“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约稿乃其天职，特别是名家的。在这一方面，我有一股牛皮筋似的韧性，一而再，再而三，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概；故先生曰‘三蒙惠书，敬悉种种’。”（1936年2月10日鲁迅致函黄萍荪）

鲁迅是韧性地战斗，陶亢德是韧性地约稿，这相持的局面，倒使我想起另一位编辑郑伟夫的韧性：“哪一天邀到张爱玲的稿子，哪一天走人！”

《人间世》杂志设“作家访问记”栏目，想着是采访鲁迅，以鲁迅书斋为背景拍张照片，并与许广平、海婴来张全家福。这次攻坚战，林语堂派遣“陶徐”两员大将同时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复

真是妙极了：“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子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也。”（1934年5月25日致函陶亢德。信后附言“徐訐先生均此不另”）

鲁迅真是幽默高手，四两拨千斤，陶徐无功而返。徐訐更惨，“均此不另”，连鲁迅的墨宝也没得着一字。

鲁迅虽然不赞成《论语》和《人间世》的文风，但是帮忙给《论语》《人间世》介绍稿子还是非常热心的。1933年12月28日鲁迅给陶亢德写信：“附上稿子两种，是一个青年托我卖钱的，横览九州，觉得于《论语》或尚可，用，故不揣冒昧，寄上一试。犯忌之处，改亦不妨。”1934年4月16日，鲁迅给陶亢德写信：“有一个相识者持一卷文稿来，要我寻一发表之地，我觉得《人间世》或者相宜，顷已托书店直接寄去。究竟可用与否，自然是说不定的。”《人间世》倒是很给鲁迅面子，此“一卷文稿”于《人间世》连载了六期。提携青年作家，是鲁迅一贯的主张。

■聊书

每个人都无可逃避

曲 宏

惊蛰万物复苏，冬来大雪纷飞。天地冷暖转换，人生朝乾夕惕。在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中，生命同样经历春夏秋冬，品味生与死、爱与恨的百味人生。即使最普通的人，生活也要经历虚幻与真实，也要经历大雪与爱情。生活有生死磨难，生活是一场非凡的冒险，生活残酷而温暖。

■《大雪将至》

作者罗伯特·泽塔勒当过演员，当过编剧，他知道不动声色的叙述更能打动人。所以，这部小说的叙述整体是平静而非激情的，这平静却会让人感受到一股直抵心底的力量。

人的命运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我第一遍看《活着》的时候，就为人物承受那么多的苦难而流了泪，《大雪将至》的主人公艾格爾给了我跟福贵同样的感受。

这部小说叙写了艾格爾的一生，他从小命运坎坷，童年被养父打断腿，成了残疾人；他与妻子玛丽的爱是整部小说中唯一的暖色，但一场雪崩之后，妻子永远消失在粉末状的大雪下面，他又一次陷入孤独。在冰天雪地里，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予的一切。他经历了战争，最惨的是，战争结束七八年，他还被关在战俘营里。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里 的许多死尸和死尸狰狞、痛苦的表情。

生命往往面对苦难才显示出力量，艾格爾平静地承受着一切，没有怨恨，没有怒火。他晚年独居山上，给来大山的游客当向导。

生命终将迎 来一场大雪，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惊悚如此美好》

作者海飞的人生阅历丰富，他是一个小说家，一个编剧。散文作家赵丽宏曾写过一篇题为《海飞散文》的文章，对他的散文赞扬有加。他原来当过《诸暨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干了三年记者就辞职了。他写过《旗袍》《麻雀》《惊悚》等电视剧，还写过小说《捕风者》等，得过不少奖，这是位跨界高手。

他是农家孩子，放过牛，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儿。17岁偷偷报名参军，退伍后进化肥厂当保安。自学成才，当上报社记者。后来去了浙江大学，编杂志。海飞说：“我是闻着牛粪的气味长大的，我是听着庄稼们欢唱的声音长大的。”人生阅历越丰富，对生活的感悟也越深刻。海飞的散文兼具小说和戏剧的特质，有小说家的视角和敏锐，又带着戏剧元素，这是很厉害的地方。有人说，读他的散文像读小说一样有画面，又像看电影一样仿佛有幻灯片咔嚓的声音。

这部散文集，海飞回首自己半生旅途，既写生活，也写工作。他的散文有一种诗意，流淌着细腻的情感，又充满了对生活的洞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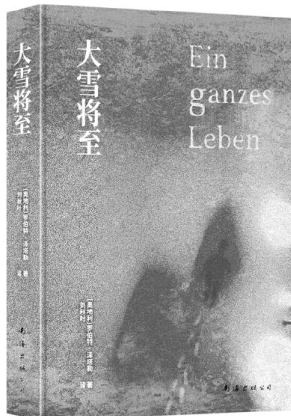
在海飞文字中穿行，你会有种感觉：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日月书：古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

作者王臣是位80后作家、编剧。他写作涉猎的内容广泛，从人物传记《喜欢你是寂静的：林徽因传》《世间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传》到长篇小说《世界上最疼爱的那个，还在吗》《一个人，也好》和散文集《一个人流浪，不必去远方》等，都是畅销书。他的文字优美清丽，繁花似锦，让人流连忘返。

品读古诗词，就要进入到那真淳优雅的境地，让大脑和心脏都呼吸到那一缕缕清新的气息。王臣品读古诗词的文字弥漫着古风古韵，勾勒出的美妙境地与古诗词浑然天成、融为一体。《日月书：古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以二十四节气为脉络，将古诗词的品读与二十四节气完美结合，从文化、风物、民俗的视角审视大自然的时令变化，娓娓道来，文字也像古诗词一样美，让整个 人沉静下来，细细凝眸。其封面、装帧、插图，也美。

■《大雪将至》



■《惊悚如此美好》



■《惊悚如此美好》

■《日月书：古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

